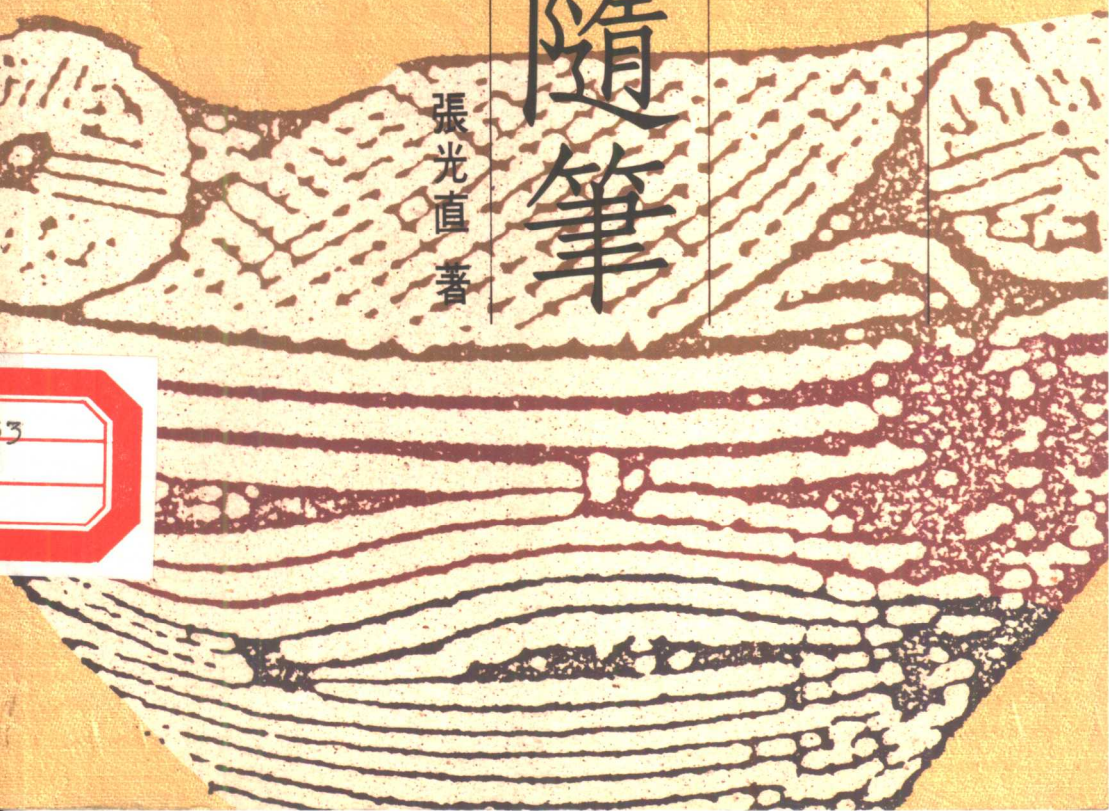




考古

人類學隨筆

張光直 著



K85-53
Z109

考古人類學隨筆

張光直 著

平 66159

102

考古人類學隨筆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臺幣180元

著者	張光直
執行編輯	鄭秀蓮
發行人	劉國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3620308・7627429
郵撥電話：641866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442-X(平裝)

前 言

這本小書所收的四十篇文章，絕大部分是已經發表過的。其中很多篇原來發表在中國的報紙和雜誌上，是以社會上一般人為對象的。有幾篇學術味道比較濃厚些，但也是朝著深入淺出那個大目標努力撰寫的，相信讀這本書的人，不會遇到生澀難解的語言問題。

四十篇分入五組，第一組我叫它作「狗尾『序』貂」，是因為為了它作序的書，都是非常值得讀的書，我寫的序夾在書裡，沾著原書的光，也許有人看一看。第二組文字我給它取了「大題小作」這個名銜，表示我不是不知道大題不宜小作，但我希望讀者們能透過紙背看到這些簡短結論有龐大的基礎。第三和第五組文章的標題不言自明。第四組是我為北京《中國文物報》自1993年夏季開始寫的一個專欄。因為《中國文物報》寄來給我常常脫期，我不知道是否寄去的稿件全都發表。在題目後的星星下面如果沒有注明年月日，那篇文章便是根據原稿排版的。如已發表，便依印出來的語句。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歷年來出版了我好幾本書，相信都是賠錢貨。這次又同意出這本書，我很是感謝。

目次

前 言	i
-----------	---

一、狗尾「序」貂

《時間與傳統》序言（布魯斯·坎格爾著，蔣祖棣、劉英譯〔1991〕）	3
《安陽》張序（李濟著，賈士衡譯〔出版年代不詳〕）	8
《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慶祝鄭德坤教授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周年論文集》序（鄧聰編〔1994〕）	10
《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序（宋文薰等編〔1991〕）	15
《中國著名古墓發掘記》序（朱啓新編〔1995〕）	18
《先秦考古學》張序（林壽晉著〔1991〕）	22
《李亦園文化論著選集》序（李亦園著〔出版年代不詳〕） ..	24
《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序（陳其南著〔1987〕）	27
《臺灣考古學書目》序（臧振華、劉益昌等編〔出版年代不詳〕）	31
《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張序（陳秋坤等編〔1992〕） ..	33

《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張序（張炎憲等編 〔1993〕）	35
--	----

二、大題小作

在學術上迎接二十一世紀（1988）	39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與中國的現代化（1990）	43
從中國古史談社會科學與現代化（1986）	49
人類學的社會使命——評介陳其南《文化的軌跡》（1985）...	55
再談人類學的社會使命——簡介「文化長存學社」（1986）...	58
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國際研討會開會致辭（1994）	65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該躋身世界主流（1994）	68

三、關於臺灣

臺灣考古何處去？（1992）	73
《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發刊辭（1986）	80
臺灣史必須包括原住民的歷史（1994）	82
臺灣應有像樣的地方性歷史博物館（1986）	86
關於臺灣省歷史博物館的幾點建議（1988）	90
政府對走私文物市場有無政策？（1988）	92
搶救圓山遺址（1986）	94
臺灣考古學者該與福建和東南亞交流了（1988）	97

四、一個考古工作者的隨筆——《中國文物報》專欄

寫在前面的話	103
談「圖騰」（1993）	105

介紹林壽晉《先秦考古學》(1993)	107
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創立四十四年(1993)	109
建議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讀民族學(1993)	112
要是有個青年考古工作者來問道(1993)	114
談文物盜掘與走私(1993)	117
北大考古系賽克勒博物館開幕有感	119
懷憶民族學前輩學者凌純聲先生(1994)	122
考古工作者對發掘物的責任與權利	124
撰寫研究計畫申請經費經驗談	127
追記臺灣「濁大計畫」	129
從俞偉超、張忠培二先生論文談考古學理論(1994)	132

五、雜文

新年三夢(1988)	143
談龍骨與龍(1988)	145
懷念高去尋先生(1991)	149
臺灣新考古學的播種者——憶李光周先生(1987)	154

一、狗尾「序」貂

《時間與傳統》* 序言

布魯斯·坎格爾教授的《時間與傳統》是一本講考古學理論的好書，在美加考古學界也是受人尊敬和重視的一本書。它的中譯本對現階段中國考古學的進展應當是有積極影響的。

考古學理論在中國一向不大受人重視。最近兩年來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鑑》對當代中國考古研究活動固然是很可靠的反映，而在這裡面根本沒有「考古學理論」這個範疇。可見，「理論」這件東西在當代中國考古活動中可以說沒有什麼地位。我相信：中國考古學界對理論的漠視不是偶然的，而有它歷史上的一些因素。首先，中國傳統史學本來就缺乏對歷史理論的有系統的討論。黑格爾曾經說過：「中國人的歷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確的事實，而對它們不加以任何意見或推論。」固然這種觀察是很不可靠的，但傳統史學的確有特別著重對客觀史實的記述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則是利用史實的選擇和描述來表明歷史學家對價值系統的主觀判斷，所以自孔子以來便有「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現象。這種憑主觀判斷來解釋歷史的作風，自有它趨於極端的一面，所以近代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以後，便首先以傳統史學

* 布魯斯·坎格爾著，蔣祖棣、劉英譯（三聯書店出版，1991）。

的這一特徵為打擊的對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人傅斯年先生在1928年出版的《集刊》發刊詞中就疾呼要打倒「把那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或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為一氣的人」！歷史語言研究所代表的史學觀認為「歷史學不是著史」，「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

可以說，以反抗傳統史學之末流的仁義道德史學為特徵的這種史料學，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占據領導或至少是優勢地位。在這種歷史觀培育下發展起來的考古學，也就特別重視考古材料的獲取和考證，而不信任主觀的理論，常以為「理論」不過是一種成見，因而把理論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嚴謹的治學方式。這種以史料及史料考證、排比為主的歷史觀在近三四十年曾受過劇烈的批評和批判，而且近年來中國歷史界對歷史理論進行討論的興趣也有很大提高。不過，在考古學上唯一有系統的指導理論，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觀。關於這種理論在考古學的作業上如何具體運用，一直很少經過縝密的思考和田野實踐。所以，馬恩的唯物史觀雖然對中國歷史在宏觀上起了巨大的、高級的指導作用，不過據我的觀察，它還沒有廣泛地在中國考古學的作業上發揮很大的具體作用。

其實，要討論考古學理論在中國考古實踐中的作用和意義，我們首先得說清楚在我們使用「考古學理論」這個名詞的時候，我們所指的概念是什麼。最近在《考古學專題六講》這本書裡，我把自己對幾個常用的有關名詞的用法說明了一下：「資料」是研究歷史的客觀基礎；「技術」是取得資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資料的手段；「理論」是研究人類歷史的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並反過來指導具體的研究工作。上面這個對理論的定義，我

想一般是可以使用的。但這個定義比較狹窄嚴謹，因而在一般的運用中，我們不妨把它放寬些。我們可以說，考古學上的理論是在考古作業的每個步驟上指導我們作何選擇，如何作此選擇的、關於文化現實、社會現實的有系統的一套看法和想法。換句話說，在考古實踐中，我們應當先知其所以然才能決定其然。使我們能知其然的便是考古理論。口口聲聲說他不相信考古理論，或者說他沒有考古理論的人，並不是真沒有考古理論，而是只有未經檢討的、不成系統的、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亂的理論。進行考古實踐並不是遵循一條不變的道路盲目自動地向前走，而是每一個步驟都會碰到岔路，需要加以選擇。有理論的人進行這種選擇是有根據的、有信心的；沒有理論的人，進行這種選擇是盲目的。

我們不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考古實踐離不開考古理論。我們到田野去調查遺址的時候，應該如何調查？考古調查不是只有一個不變的方式，而是根據我們調查的目的和對古代文化社會生活的不同了解而有所區別。有人看到不同的遺物群便把它們當作不同的文化；另一些人則把它們看作是同一或不同文化對不同生活需要所做的不同適應性行為的表現。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便對我們調查的範圍、深度、順序以及發掘與否等諸決定，有很大關係。考古發掘更是一套複雜的程序，從打樁子到回填之間一步步的工作應如何進行，有著許多不同的方式。怎樣能忠實地記錄資料，同時又能提供回答特定問題的資料，這就要看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的具體地點、範圍、各種專業人員的使用、發掘的細密程度等等問題上進行怎樣的選擇。發掘出來的遺物如何進行處理？有哪些可以留下來，哪些可以拋棄？對器物進行分類是爲了什麼目的？爲了這種目的又應當使用哪些分類標準？——這一連串的問題都

是每個考古工作者必須回答的。無論是否意識到自己的理論體系，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在進行自己的選擇時，考古學者是一定要應用他對歷史認識的理論的。這幾個例子應該可以說明考古理論與考古實踐不可分割的關係。理論並不是一種空洞的主觀成見。它需要與客觀資料相對照。考古工作者不會沒有理論，只是有人有好的理論，有人有不好的理論。如果有的考古工作者認為考古學的理論不足重視的話，我們不妨問一問，是盲目地使用主觀的、未經檢討的理論好，還是先對自己的理論體系作一番檢討好呢？

四、五十年來，世界考古學理論的中心很顯然是在美國。這並不是說美國有最好、最正確的考古理論，而是說美國考古學界的理論是多元化的，也是特別發達的。因此，考古學工作可在許多豐富的理論體系中作適合自己立場與見解的選擇，並且在這些體系中不斷得到啓示和刺激。事實上，就西方考古學史來說，考古學理論的有意識的發展也不過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的現象。在這以前，西方考古學也是以器物為主要對象的。即以器物史的發現和文化史的重建為主要的目標。因而，這種研究的主要方法便是年代學、地層學和類型學。三十年代歐洲考古工作者開始對這種情況感到不滿，不少人開始主張，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應當從器物轉向人。考古學資料是物。如何從物去研究人的生活，這便要有借於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論的指導。在這方面比較有名的一篇文章是英國戈登·柴爾德在英國史前學會1936年年刊上發表的一篇〈史前史變化中的方法與目標〉，其中就大力主張考古學者在理論上要有意識、有系統地討論如何研究史前時代經濟生活、社會生活這一類的問題。這篇文章在西方考古學界引起了廣

泛的注意。不過，考古學理論的蓬勃發展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自四十年代晚期到五十年代初期開始，關於這方面的討論研究的中心轉移到了美國，並且數十年不衰。自1950年以來，美國考古學理論的書刊與論文無慮有數千、數萬之多。中國考古學界如果對這方面有加以探索的興趣，這無疑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園地，其中有不少值得參考，值得作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選了布魯斯·坎格爾這本書翻譯並介紹給中國讀者是最合適不過的了。正因為考古學理論在美國特別發達，以致各種說法五花八門，令人眼花撩亂，而且其中良莠不齊，有精華也有渣滓，要在美國關於考古理論的千萬種著作中汲取精華，必須首先作一番爬梳清理工作，除滓存精，才不致事倍功半。布魯斯·坎格爾是加拿大人，在蒙特利爾的馬克給爾大學任教。他的博士學位是在美國耶魯大學得到的，而且多年來，他在美國考古學理論界一直占有一席非常令人重視的地位。他所以為人重視的一個主要原因，便是他不僅有精深的見解，而且持論公平，不屬於哪門哪派，對當代各種新舊說法都能客觀地做正面、反面的檢討和批評、整理。讀者讀他的文章，能中肯地把握理論上的一些基本竅門，對各派學說的要旨優劣都能掌握，最後可以作明智的抉擇。現在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在即，相信它對中國考古學理論方面的進展一定會起積極、肯定的作用，所以很高興地寫這幾段話以誌同聲之欣悅。

張光直 1987年4月於美國哈佛大學

《安陽》* 張序

《安陽》是先師李濟先生最後的一本專著；像它的作者一樣，這本書在中國考古學的園地裡是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如今它的中譯本問世在即，令人感到興奮。

自從1928年第一次發掘安陽殷墟到今天已經六十三個寒暑了。我們對殷墟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上重要性的認識，不但沒有被歲月的消逝所沖淡，反而越來越在中國考古學持續發展過程的啓示之下而更覺得清楚了。這個重要性，一方面是由於殷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用現代科學方法作長期發掘的遺址，所以在殷墟發掘過程中考古學者們所經驗出來的心得，對以後半世紀中考古工作者思想和作業的習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殷墟是目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有文字記錄的考古遺址，它對於中國史前和歷史時期間的關係的了解上，便發生了承先啓後的作用。至少在目前的知識範圍之內，我們可以這樣說。學習中國考古學者最好自學習殷墟開始；學習中國近代考古學史者，也最好自學習殷墟開始。

從中國考古學史上說，李濟先生的名字是與殷墟分不開的。

* 李濟著，賈士衡譯，序寫於1991年5月4日。

有中國考古學之父的稱號的李濟先生是中央研究院自 1929 年到 1937 年發掘殷墟工作的總指揮。在 1949 年以後李先生又在臺灣用了三十年的時間進行戰前發掘出來的成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一生的學術著作也以殷墟和殷商文化為中心。給學習殷墟的學生帶路的人，再沒有比李先生更合適的了。這本《安陽》是李先生給殷墟發掘和研究所作的一個總結。教中國考古學的課用這本書作頭一本入門書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可是《安陽》原書是用英文寫的；在國內教書的人對這本書的中文版的問世，可以說是久已望眼欲穿了。

賈士蘅女士翻譯這本書為中文，也是再合適不過了。李先生寫這本書的時候，年紀已經很大，身體欠佳，行動不便，在這本書的材料搜集與寫作上，賈女士給了李先生很大的幫助。如今由她自己翻成中文，自是駕輕就熟，對作者的原意也比任何他人都能了解。賈女士囑我為中譯本作序，就寫了這幾段話以誌喜悅。

張光直 1991年5月4日

《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 ——慶祝鄭德坤教授從事學術活 動六十周年論文集》* 序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研究中國南部及鄰近地區的國際性的研討會，將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越南的四十四篇論文，編集出版，這是中國地區考古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國南部考古學起步較北方為晚，在過去又由於傳統史學重中原輕邊疆的偏見而被忽視，所以考古與古史研究成果不如華北。近年來，部分由於南方經濟的發展，考古材料出土增加。南方各省的考古文物單位，包括香港中大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在內，又有計畫、有目的的擴大了調查、發掘的規模和範圍，發現了許多引起國內國外密切注意的新資料與新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在此時此地召開這個學術研討會，可說正是迎合天時地利人和的良機。

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這個會議上，同時要慶祝人類考古界前輩學者鄭德坤教授從事學術活動六十週年，這尤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鄧聰編（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